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一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八二期 ——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2e）

【书刊评论】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唐少杰
【广阔天地】	难忘的一九七一	唐晓峰
【往事追忆】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戴维堤
【难忘岁月】	潮起潮落	梁守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 唐少杰 •

2008年春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该校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1972—1976），即由史云先生、李丹慧女士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不仅在这套十卷本国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史的三卷文本中举足轻重，而且可谓关于文革后半期的史书，或曰“半部文革史”，显然，这一卷国史在时间上涵盖了文革十年史的后半部分。包括这一卷国史在内的十卷本国史的完成和先后问世，堪称2008年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更堪称在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对于1949至1981年新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巡视性”的深刻反思。

由学术同仁所主办的电子杂志《记忆》第六期、第七期上发表了丁东、余汝信、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卷国史的评论文章。我个人认为，丁东、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卷国史的评论十分中肯；我要坦率地说，余汝信先生把这一卷国史称之为依然囿于文革研究“旧思维”模式中的“新瓶里的旧酒”，颇为不妥。余汝信先生的批评主要限于这一卷国史对于1972年8月美国学者维特克采访江青一事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评述的问题。然而，在这一卷国史第五章第三小节的“‘红都女皇’之谜”，并不能代表或影响这一卷国史的整体或主体。因为，众所周知，对于“红都女

皇”这一事件的确证还有待于更多、更机密的历史档案材料的公布以及相关的细致梳理和严格考证，也更有可能进一步证明和充实余汝信先生本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深刻分析和论点。

在我看来，对于这一卷国史的准确评价，一方面，应该把它同这一套国史已问世的第六卷（1966—1968年）即卜伟华先生著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和即将问世的第七卷（1969—1971年）即高华先生著的《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有机地加以联系起来。这三大卷本国史的出版，蔚为壮观，它们毕竟构成或将要构成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评述文革历史的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这一卷国史与卜伟华先生的第六卷国史、高华先生的将要问世的第七卷国史（其若干观点已在“学术中国”等网站上和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一起，标志着在文革故乡，反思和研究文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与在文革故乡先前的和当下的关于文革历史的著述相比，更是有了在史料整理、史事考证、史识方法和观念批判等方面新的、质的飞跃，进而，真正表明了中国人自己反思和研究文革现今所达到的水平或高度。

实际上，这三卷本国史，完全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大部头的文革史，应该加以集结，单独出版、发行。这三卷本国史的作者们，无论是来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还是来自当代中国史研究部门，无论是执教于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历史学系，还是带有某种自由学者和民间研究者的特点，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质上改变了中国学者在文革研究领域远远落后于国外学者（包括华裔学者）的状况，这也意味着作者们为结束那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迈出了扎实而可喜的一步。从我目前通读的这一卷国史以及卜伟华先生的第六卷国史所得到的感受，我愈益坚信，中国大陆学者反思和研究文革已从整体上远离甚至“告别”了官方“钦定”的文革论说模式。

概而言之，《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这一卷国史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全书拥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不是中共的叛徒的考证，对毛泽东与“四人帮”尤其是与江青的关系的确证，对邓小平1975年“整顿”“不摸脉”的论证，对“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伪造这种长期流行不衰的说法的否定，对“四人帮”有一个政变计划的否定，等等，在这些方面，这一卷国史为力争使其概述和把握文革的历史成为信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是全书提供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史料。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接班人的考虑和筛选问题的梳理，对于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历史反省和1973年底因与美国的的关系而受到政治局批判之事的辨析，对于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事的分析，对于粉碎“四人帮”一事的来龙去脉和相关当事人不同作用的评述，等等，在这些方面，这一卷国史为广大读者纵览文革历史提供了比较广阔而清晰的视阈。进而，若是作者能够更加明确、详细地注明引用或引证的那些重要的或关键的史料的出处，那无疑是锦上添花。当然，我本人也充分理解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难处。

三是全书映现出两位作者的可贵的研究风格和著述取向。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既有力地缩小了中国官方文革论述文本中那种“为尊者讳”的通病，又痛切地削弱了在中国文革话语和论域中长期盛行的“为污者讳”的顽症，即“不愿意去洗刷那些事实上并不属于污者的污垢”（第5页）；另一方面，把研究的关注点和著述的切入点不是仅仅限于文革权力上层的范围、文革的政治层面或文革风云人物的变迁，而是相当深切和广泛地涉及到了文革当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大众心态、社会思潮（包括“异端思潮”、青年读书生活和“地下文学”）以及文革的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层面。而所有这些，在突破了过去中国大陆记述文革的话语的呆板、片面以及论及文革的着眼点的单一、狭隘的同时，就完全有可能多层面、多维度、多交叉地“再

现”出文革社会历史生活的画面或景观。

四是这一卷国史关于文革外交问题的第二章和关于文革经济问题的第四章，十分突出地显示出了两位作者各自所专长的文革的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及其功力。这两章不仅在史料的运用和数据的整理上做到了翔实和厚实，而且对相关问题的展现和把握也达到了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并且富有新意地揭示出了文革在外交领域和经济领域所走过的那复杂、多元、曲折的历程。读了这两章，很容易使读者去思考下面两点：文革外交史和经济史与文革政治史既有关联更有不同；文革后期的外交问题和经济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文革政治问题乃至意识形态观念问题的某种解构。

五是全书洋洋洒洒，近六十万字，全书十章的框架大致上是按照时序论及1972至1976年的文革政局、外交、中共党内斗争、经济、军人势力变迁及“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会议之争、文教卫生及异端思潮、邓小平的“整顿”、“批邓运动”、粉碎“四人帮”。全书的结构比较合理，章节安排严谨，条理清晰，绝大多数的论述既没有那种纯学术的抽象色彩，也没有那种历史流水纪年似的平淡气息，而是在不少地方，字里行间，饶有余音，真知灼见，颇具回味。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卷国史有几个在史事或史事界定上的错误，具体如下：
第66页上，说“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应为“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孙女。
第308页上，称“海军副司令员陶勇上将”，不对，陶勇的军衔实为“中将”。
第443页上，讲“交响乐《黄河》等……”，不准确，应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等”。
第474页上，提到“加缪”和“萨缪尔森”的名字，中文习惯用法为“加缪”和“萨缪尔森”。
第476页上，提到复旦大学“胡守均”的名字，应为“胡守钧”。
第600页上，讲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把这位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说成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对，戴维·艾森豪威尔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据悉，20世纪50年代末，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园地，就是这位总统以其孙子名字所命名的著名的“戴维营”。

我希望两位作者今后在修改这一卷国史时订正上述这些错误，并且衷心祝愿两位作者今后有更多更新的反思和研究文革历史问题的力作问世！

~~~~~  
【广阔天地】

难忘的一九七一

• 唐晓峰 •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

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歌”，就是“四歌”，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

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耩（用耩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间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 New Paltz 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

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铎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着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犹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

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罗，‘一将功成万骨枯’罗，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习惯于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



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龋齿，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褪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

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

《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弩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弩）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

褪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体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

【往事追忆】

北航“清队”自杀事件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8年初，伟大领袖发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他老人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一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清理阶级队伍则不但对当权派，对普通干部、教职工和群众中的坏人和有问题的人也需要清理出来，免得他们兴风作浪，为国民党效劳。据说这对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会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团结”，北航红旗一统天下，没有对立派组织。北航革委会在当时许多院校正进行武斗、连革委会也成立不了的情况下，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韩爱晶等人研究决定，成立了以革委会副主任井岗山和王a（原党委书记）为首的清队“七人领导小组”和“第七办公室”，领导全院的清队运动。之所以叫“七办”，是取前苏联当年的“契卡”的谐音，这是韩爱晶的文字游戏。

作为革委会委员和组织保卫部长，我被列入“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但不管专案，只负责保卫工作和日常事务，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捣乱。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领导小组”主要由几个三结合老干部们主持日常工作。

清队工作一开始，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

教务部有几个教师，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怨恨，当然谈话中免不了骂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类的言论。后来，其中的一个教师反戈一击，“出卖”了他们，并写了揭发材料。教务部的头头们一看，大吃一惊，便把有关人员找来交代问题，结果他们都承认了自己的“反动言论”。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伟大领袖不用说骂，连发句牢骚都是反革命。教务部的头头们把材料上报了革委会和“七人领导小组”。由于言论太反动，决定召开批斗大会。会后，决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机关。革委会把材料上报了北京卫戍区。过了几天，卫戍区把人抓走了。这个大会起了杀鸡吓猴的作用，许多人会后都主动交了自己的问题。

北航“清队”工作继续进行，但很快便有人陆续自杀了。有些人仅仅在基层单位被群众勒令交代问题，一未关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楼、上吊了。

死了人归我处理后事。我对自杀现象很有意见，便向主要头头反映，应想办法制止自杀现象。

不料主要头头和个别老干部说：“你年轻，未见过世面，哪有运动不死人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不少人自杀，这是正常现象，不要大惊小怪！”

“那死了人你们来收尸！我见了死尸就头晕。”我没好气地说。

我认为死人总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张以保卫部的名义发了通令，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千万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好办了，将来平反也晚了。运动后期才做结论，你现在着什么急？如果谁再随便自杀，将以破坏运动论处……

“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你开什么玩笑？”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评了一顿。

批评归批评，自杀事件仍有发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见。清队领导小组便决定把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24小时派人看管，防止自杀。于是革委会在八号楼设立了“牛棚”，把许多专案对象关了起来。

北航清队期间在八号楼设“牛棚”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剥夺人权的法西斯行为，但是，自设了“牛棚”后，再没有人自杀了。这也叫歪打正着吧！看来“牛棚”不全是坏东西。文革中，各单位不管是整老干部，还是清队整群众，还是抓“5·16”时整红卫兵造反派，没有不关“牛棚”的，决不只北航一家。据我所知，文革中全国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监狱”和北京卫戍区的西郊“监管所”，关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忆起来，北航当时有两起自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开会，有人报告校办工厂厂长家门口流出了许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带人赶到了现场，只见一间平房门紧闭，从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开了房门，踏着厚厚的血迹进了屋。一个东西把我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人头。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两具尸体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厂厂长和他的老伴。老伴的头已被割了下来。男尸的头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仅有一块皮连着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屋里有一张双人床板，床板的一头捆上了一口袋粮食，一根绳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

关着，门是我撞开的，排除了他杀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赶到后，对现场的床板解释不清，作不了结论。

有关人员告诉我，死者历史上可能有些问题。运动开始后，有群众揭发让他交待问题，没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问题暴露后日子不好过，便想自杀，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与他一块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杀死老伴，便想了个同时死的办法。半夜里二人把双人床板一头绑上了一口袋粮食立了起来，以便倒下时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离和位置，便双双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绳子，让倒下的床板边正好砸在脑袋上……据邻居们反映，半夜里确实听到一声巨响。

但是由于重量不够，床板倒地时没有立即将二人脑袋砸碎，仅砸晕了过去。男方醒来后，见事已如此，便横了心，爬起来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头割了下来，又割断了自己的脖子……

公安局的同志认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简单，不愧为保卫部长。他们以此作了结论，同意将尸体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自杀和杀人情节、手段看来，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过一定训练。但就算受过特务训练，也没有必要这样想不开自杀。

据后来了解，死者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有关组织，档案里有记载。群众让他交待问题就交待吧，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应该自杀并搭上了老伴一条命。他把问题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当官了，也不至于被群众打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畏罪自杀。现在看来这老两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同国民党沾边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产党的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来，同国民党沾边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杀事件，更加悲惨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体自杀事件。

校医院有一位女医生，不知她和当教师的丈夫因什么问题也不想活了。据一些老干部讲，凡搞运动，自杀是难免的，而且象传染病一样，一个人自杀了，另一些人象受了传染一样，也纷纷自杀，不知怎么回事。

女医生夫妇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身体健康的母亲，两个可爱的儿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属楼单元房里。

我闻讯赶到现场时，破门而入，立即被一股浓烈的“敌敌畏”气味顶了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捂着鼻子，又冲进了屋内，迅速打开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几个风扇向外吹风，我立即查看现场。

室内摆设整齐，干净利落。双人床上，女医生夫妇并肩躺着，穿着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体早已冰凉。桌子上两大瓶“敌敌畏”，已所剩无几。

另一间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太太，盖着被子，死态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别躺着两个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赶到后，认为事关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医生夫妇看来

是喝的“敌敌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难道他们也愿意自杀吗？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开了核查。现场楼房单元门窗完好，门是我撞开的，外人作案被排除。这时在楼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针的针管和剧毒X X灵药瓶。据校医院有人证实，女医生从医院私自拿回家两瓶剧毒X X灵。

公安局的同志发现了老太太和两个孩子胳膊上有针眼。经初步断定，女医生夫妇决定自杀后，不愿留下母亲和儿子受罪，便骗他们打什么防疫针之类，老太太和儿子当然不怀疑。剧毒药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时，夫妇俩给他们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着他们安静地死去，然后，夫妇俩穿戴整齐，同时喝下大量“敌敌畏”，并排躺在床上，也双双死去。这就是结论。

“太悲惨了，这个母亲太残忍了！”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说，“我们见过许多自杀案，但象这个案子实属罕见。女医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来。”

我和有关人员把五具尸体抬下了楼，让人送往了东郊火葬场。“敌敌畏”呛得我一天未吃饭，只想呕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医生夫妇为什么全家人自杀？因为什么问题导致如此惨剧？估计可能也是历史问题吧！据事后教务部和校医院的人说，清队以来，没有人对女医生夫妇实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当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说，市局军管会领导对这起自杀事件很重视，决定派法医去火葬场验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学生（其中包括两个胆大的女同学），开车到公安局接了法医，赶到了东郊火葬场。

停尸房里摆着数十具尸体，估计全是自杀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未来得及火化。下午送来的一家五口人的尸体找到后，法医让我们一具具抬到门口灯光底下，准备解剖。盛夏季节，现场苍蝇蚊子满处飞。

身为保卫部长，我当然不能胆子太小。当时年轻，对什么都好奇，解剖尸体这种事更是没见过，随我来的保卫部学生同我一样，都有好奇心，想开开眼界。我们抬起尸体来，咬着牙，歪着头，憋着气，闭着眼，那样子惹得法医大笑。

法医30多岁，穿着短裤短褂，口罩也不戴，对着尸体下了手。

每具尸体的程序一样，开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胆汁、肌肉等分别装进一个个小瓶子里，贴上标签。我和同学们为法医打下手，递瓶子。

每具尸体的胸部划上一刀，打开胸腔。法医用两手插进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响，夜深人静，令人毛骨悚然。法医一边干一边同我们聊天：“医生嘛，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就如同一头猪一样，没什么可怕的，当然当着死者亲属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让亲属看见。”

法医每处理完一具尸体，都把刀口缝好。我问为什么，法医说，人道主义嘛！

处理完五具尸体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个晚上。

后来公安局通知说，女医生夫妇胃里有大量的“敌敌畏”，老太太和两个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剧毒药，五人皆中毒死亡。女医生夫妇先用注射毒药的手法杀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双双喝“敌敌畏”自杀，据此做了结论。

这起五口人自杀死亡事件轰动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队”以来自杀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会和清队领导小组在我和许多人的强烈要求建议下，迅速设立了“牛棚”，把有问题的人关了起来。关人不对，但从此杜绝了自杀事件的发生。设“牛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空见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北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关押了不少人，据我所知，自杀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二人，有一起五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作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清队七人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我不承担主要责任，但我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我应当向北航文革清队中致死的人员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后来北航的新当权者在清查“5·16”运动中和清算韩爱晶等人的问题时，对每一个自杀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对被审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这是正确的。但北航抓“5·16”时关“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过自杀的人少点而已。

后来的当权者也把我们关进了“牛棚”，我辈中也有人想不开自杀了。文革以来，中国人都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马灯”，除了极个别真正的逍遥派外，几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革。

对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杀者，大难不死的笔者在向他们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感慨万千，特别是对于一些枪林弹雨过来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杀万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杀。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和灾难。作为社会人，谁不干事？既然干过某些事，就要准备被别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杀头。如果明知自己是无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应该自杀，必须坚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来。我的经验是，干过的事就老实承认，没干过的事死不承认，宁可被打死，也决不自杀。哪怕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杀头，今天晚上也要“潇洒走一回”。说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一切皆烟消云散，雨过天晴。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给你平反也晚了。

~~~~~

## 【难忘岁月】

### 潮起潮落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七章：“潮起潮落”，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简称《九条》）宣布了“一·二六”夺权的结束。《九条》决定把我和“八二七”从精神的巅峰推到精神失落的深渊。这时，我才开始真正认真思考周恩来三月十三日的讲话。李胜利传给我的周恩来讲活不只是不再承认安徽夺权，后面还有一句更

为重要的话，就是“以后的夺权，由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我当时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央很快承认安徽的夺权，至于以后中央如何一个一个地解决其他省的问题，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没有深想。在周恩来的讲话里隐含了“一月风暴”式的群众夺权告一段落。毛泽东又总结了什么新的经验和新的战略部署，我们并不知道。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上毛主席加写的一段话可以窥见一斑：“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重了。”

毛泽东的这段加语，是针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而说的。时隔三天，也就是四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十条命令》，在《十条命令》中，毛泽东又加了几句话：“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被反革命分子控制，或情况不清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从毛泽东的加语中，能体味到在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时候，全国的支左工作和军内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是体现一个“放”字，否定安徽夺权源于一个最大的潜台词，在支左部队的高级将领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在北京市时隐约听说大闹怀仁堂的问题，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更没有多想。但《九条》下达后，除北京市的特殊情况外，中央再也没有承认“一月风暴”中群众夺权的任何省和市。实际上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不仅否定了“一·二六”夺权，也为“一月风暴”的结束，盖上中共中央的印章。随之而来的是按“五一六”通知，解决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一月风暴”由夺党内、政府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吹响了大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进军号。这股风是从大闹怀仁堂事件吹起的。在这场新的风暴中，最早响应号召出来支左的解放军怎么办？受到解放军支持的“左派群众”又该怎么办？我和“八·二七”迷茫了，落伍了，成了死保省军管会、省军区的老保；解放军犯了支持夺权、压制反夺权的路线错误，我们犯了支持解放军压制炮轰派的错误，这与文革初期有类似之处，这大概就是潮起潮落，此一时彼一时吧！

我们大约是二十九日回到合肥。回到合肥后，我一头钻进工大无线电系学生宿舍楼，想借此机会全身引退。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首先是来自“P”派的宣传，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以不同的形式公布北京谈判过程中，康生是如何拍桌子训李文安；康生、关锋如何算任质斌的旧账；怎样把严光批评的头上冒汗；王力在钓鱼台大讲“一·二六”是假夺权；程明远讲李葆华给梁守福三万块钱等等。这些宣传大大地刺激了“八二七”战士。他们成批成批地到工大找我问个究竟。同学们的提问大大地刺激了我。其次是“八二七”战士的劝慰和激励。许多同学在讲到“你躺下，我们怎么办？难道‘八二七’战士的鲜血白流了吗？”时，他们激动得声泪俱下，这使我仿佛又听到“抬头看见北斗星，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既催人泪下又催人团结奋进的歌曲，“八二七”就是唱着这首歌曲战胜了压制和迫害，我心中不服气的火焰被点燃了。不能躺下，我没有权力对与我浴血奋战的“八二七”不负责任。于是我决定继续战斗，召开“八二七”兵团常委会。经讨论，兵团常委会决定：四月四日召开“八二七”兵团战士委员会，各纵队、（包括中学联队）支队干部一并参加，由赴京代表团成员（除军队）向大会如实汇报北京谈判的情况，作为对“P”派宣传的一次回应。后来，又把这个会叫做“交底大会”。

这个会是在工大东操场公开举行的，参加人较多。首先由李胜利和李文安汇报中央接见情况。不否认“P”派宣传的许多东西是事实，也说出了康生、王力、关锋等人经常吹胡子瞪眼不让“G”派代表发言。后来又让同学们用递条子的方式提问。工学院有同学就要我回答，李葆华给我三万块钱是不是事实？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作担保，我没收到李葆华给我的一分钱”。也许同学们对这个问题很关心，我的话刚一落音，会场上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并伴随着口号声：“我们相信你们！”“八二七”永生！”

四月四日的会议，不只是向“八二七”的代表交了底，更重要的是把康生、王力、关锋等

人对代表团的压制之情传给了战士代表，又通过他们传给了合肥乃至全省的“八·二七”战士。一股对《九条》，对康生、王力、关锋的不满情绪也悄悄地蔓延着。

#### ◇ 转折

《九条》下达没几天，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十条”命令，“十条”与“八条”相比，似有纠偏的味道。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文件，在那个混乱的日子里，什么机密也保不住，何况军委“十条”命令也不是机密，在造反小报上很快就看到了。我之所以关心此事，是因为“八二七”兵团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里有支军问题，我把两个文件认真比较后，我很担心我们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糊里糊涂地成为保护军队的新老保。

正在我们担心的时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P”派组织于四月十二日，在省体育场召开批斗严光大会。其实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思潮正在全国蔓延。这件事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告诉大会负责人：召开批斗严光同志的大会是错误的，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支军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我本人当时的思想，也认为军队不能再乱，军队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也是毛主席手中最后一张牌。党、政机关不行了，群众分两派，军队再乱，文化大革命真的无法收拾。“八·二七”兵团常委扩大会议决议中明确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

十二日批斗严光大会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十三日，《安徽八二七》报根据兵团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发表了“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社论要求始终按《九条》精神，把斗争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同时把支持解放军提到很高的位置，明确表达了支军、护军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与军委“十条”命令确有不协调之处。因为我们当时并不确切知道二月间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的真象，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怎样想利用此事揪军内一小撮。

十二日没有开成的批严光大会，既使我们从《九条》下达后的被动转为主动，又是我们新被动的开始，逐步成为保军管会、保省军区“新老保”。自十二日以后，合肥出现了炮轰省军区、炮轰严光，炮轰“军管会”，甚至炮轰周恩来的思潮，这种思潮以致发展到全省炮轰派的大联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保军区的大联合。自此以后，各派组织的矛头都逐渐偏离了《九条》规定的方向。

#### ◇ 安徽干部问题

《九条》下达后，安徽本应按照中央《九条》决定，集中力量揭批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但中央的大战略部署，似乎不再是解决各省的省委问题，也不是继续吹“一月风暴”的夺权之风，而是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又觉得炮轰军队不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军委“十条”命令似有支持军内造反的意味。从大的形势看，军委“十条”下达后，被军委“八条”整肃的人员又重新活跃起来，南京有炮轰许世友的，武汉有炮轰陈再道的，安徽炮轰严光。在这种大背景下，安徽如何按《九条》精神揭批省委，似乎与大气候不太符。但省军管会坚决按《九条》精神办事，把斗争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彻底揭开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厅局以上干部大会，揭发安徽省委阶级斗争盖子。

这个揭盖子会，是个马拉松式的会议，我一次也没有旁听过。但从开会的第一天起，我非常关注，因为我想知道，揭省委的盖子从什么时候揭起。按照我的想法，这个会要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联系起来，当时正是系统批判刘少奇的高潮。如果这样揭，势必从一九六二年的“三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揭起。这样做既符合中央批刘的大气候，又符合《九条》精神。但这样做会刺激一九六二年被平反的一大批干部，使他们产生反感和不理解，

重复总指挥部揭盖子“亮相”会的老路，将揭盖子引入宗派斗争。也会使支持平反干部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军管会，指向军区。如果从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路线揭起，一是没有更多的新内容；二是会搞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人有份，不符合解放一大片的中央干部政策。另外，还会涉及许多保守组织的头头。经过干部间的激烈争论，军管会还是决定，从一九六二年李葆华来安徽主持工作后，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揭。会议开始不久，我通过“八二七”干部联络站的方维法约张恺帆见面。我约张的目的是想让他保持中立态度。因为我怕他站出来支持刘秀山、程明远等人。这样他会遭到“八二七”和与他持不同观点的大批干部的万炮齐轰。见面的时间可能是四月三十日左右，地点在原省委办公厅主任张浩家，还有原省委常委秘书长吴文瑞。其实，那天晚上我向张透露了“八二七”要轰他的消息，也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我劝他卧倒不动，对两派群众不要有倾向性，不要引火烧身，相信群众，最后我还重复一句“恺老，千万别动”。

五月十一日，“八二七”兵团在省体育场召开了约五万人参加的全体战士大会。大会的标题是：“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五月决战！”我代表兵团常委向大会作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再一次分析了安徽干部状况：“由于曾希圣同志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错打了一些干部，并且累积起来的数字比较大。李葆华利用一九六二年的甄别平反，把一些不该平反的也平了反。但我们所要打击的重点，也只能是那些完全平错了的，而且又和李葆华结成死党，干尽了坏事的一小撮人。我们揭发翻案风的目的，决不整被平反的干部，而是揭露李葆华是怎样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在安徽大搞资本主义的，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所有被平反的干部。”

其实，我这段政策交待是针对厅局长会议上出现的问题而讲的。因为在厅局长会上，就有人提出，“八二七”就想利用厅局长会议整被平反的干部，这里主要指的是程明远、刘秀山等；另一方面，我交代这些政策性的东西，也是针对张恺帆五月七日发表“紧急呼吁”的回应。因为，在这个“紧急呼吁”上签名的厅局干部近百名，结果五月九日又有近二百名厅局干部签名反对张恺帆的“紧急呼吁”，这样省直机关的四百来名厅局干部，公开分裂了。安徽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新的转折，群众组织不知不觉地卷入安徽干部的宗派斗争。

#### ◇ 走访曾希圣

由于厅局长会上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实质上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马拉松会。在首都三司联络站胡昭复的建议下，兵团常委决定，我去北京找曾希圣（当时，任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一方面请曾向周恩来总理转交我们对《九条》在贯彻中出现问题的看法材料；另一方面向曾了解安徽干部的情况。

五月十五日我到了北京，在胡昭复的联络和安排下，我于五月十六日下午，在京西宾馆楼下的接待室里见到曾希圣。他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很精干。他握住我的手说：“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你很能干。”我们坐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安徽“八二七”派人到四川把我救出来。其实，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不知谁派人救的他。紧接着他说：“你的动员报告，我看了，讲得很好。安徽的问题，就是要从六二年搞起，这样才能打中要害。”他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安徽八二七》报，指着报告中，“关于曾希圣同志错打了一批干部的”那一段话对我说：“你说我打错了一批干部，你谈谈看，我错打了哪些干部？”我当时被他问得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顺口说了“杨效椿、赵凯等人。”曾当时就反驳道：“杨效椿、赵凯他们几个人在中央下达平反通知前，我就给他们平了反，而且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接着他又说：“像李世农，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他是十个指头烂掉九个，我怎么能给他平反？小梁啊，你年轻，对许多问题不了解，我给你说一下，不是什么批评。”接着，我希望他给我们介绍几个好干部。曾说：“真正的好干部，没有那么多，我只给你们推荐一个，他就是郑锐。郑锐这个人历史清白，有能力，又有一定的文化，年纪也不大，身体无大病。其他的干部，不是年纪大就是身体不好，

摆在重要位置上，他不能办事。所以，我不给你们推荐。郑锐这个人，你们尽管大胆用。”另外，他要我们对李甫和邢浩要保护好，他说：“他们是安徽的材料库，不要被别人杀害了。”

后来我又问到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曾希圣说：“安徽的问题本来没有那么严重，是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很困难，本来想从江苏调点粮食，江渭清说，他也很困难，调不出来。这才打电话给我，周总理在电话里说‘老曾啊，你能不能调点粮食支援一下中央？’我问总理要多少？总理说‘最好是调五亿斤。’我说：调五亿斤有困难，先调三亿给中央。周总理同意先给三亿。”这时曾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小梁，你那时还在上中学吧？”我点点头说：“是”。曾接着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不懂中央和省里当时的困难，总理说话了，江渭清又不给，我能再说不给吗？都不给，中央怎么办？那三亿斤粮食确实把安徽的群众害苦了。”听了曾的一番解释，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接着我又问到“单干风”的事。曾解释说：“包产到户的事，我是先请示过主席，主席说：‘可先搞点试试。’没想到农民一试，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把面铺大了。其实，在毛主席批评单干风之前，我们省委也发现了问题，开始着手纠正。这个问题怎么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呢？‘七千人大会’上，把安徽的问题搞得那么严重，那是刘少奇想整我，我不能推，只好一个人都担起来。最后，还是总理说了话。”

临别前，我给他一小袋材料，告诉他，这些材料是我们对《九条》决定的看法，以及《九条》下达后安徽出现的问题，并希望他有机会见到总理时转给他，我们希望总理能多关心安徽的问题。曾收下材料，并答应有机会见到总理一定转给他。

十八日下午一点许，曾希圣再一次见到我，这次见面不是在京西宾馆，而是在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那天去的人比较多，有清华的学生，还有青年教师。曾的女儿也去了，她可能是学医的为了保护他父亲的健康。他说：“我今天来，是听说你今晚上回合肥，早点回去也好，安徽需要你，今天见到你没有什么更多话要说，主要是来送送你，干部问题，前天我向你介绍过了。小梁同志，看准了一定要大胆，不要怕。”以后是东扯西拉地说些别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人多，曾要我与他同车，先把我送到火车站，然后他回京西宾馆。

我同曾希圣的接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次，但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精明干练，思维清晰，也很平易近人，不像我以前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而是一个顾大局，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人。

这次北京之行我对曾希圣的感情和看法产生了重大的转变，认为曾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这个转折是非同小可的转折，它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兵团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解放干部工作上。由于“五·七”紧急呼吁后，干部明显分成两派，厅局长会议不再揭批李葆华，而是两派干部打派仗。“G”、“P”两派造反组织一方面围绕干部的宗派斗争打派仗，另一方面围绕军管会，省军区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展开激烈争论。“G”派认为军管会是按《九条》办事的，而“P”派则认为揭批李葆华偏离了大方向；“G”派认为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P”派认为军区是支一派，压一派，严光是隐藏在省军区内部的刘、邓。而且炮轰严光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地、市亦有冲击地方部队的现象。“淮南红卫军”就到处抓淮南人民武装部政委杜重山，杜只好跑到合肥躲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八二七”兵团常委感到文化大革命好像失掉了方向。似乎揪军内一小撮成了主攻方向，北京首都三司联络站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亦是人人皆知，老帅和副总理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在流传。再联想军委《十条》命令是对《八条》命令的纠偏，兵团常委们感到困惑，兵团内部也有分歧，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成为死保军队的新老保。

但多数人的认识是，军队不能轰，一定要保持稳定。即使军队有问题，也不能像轰省委那样轰军队。只能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向军队提出善意的批评。对“八二七”内部认识的不统一，也要有一个正确地引导方式。于是兵团常委决定，由我以汇报北京之行为名，大谈干部问题，把“八二七”干部的思想引到解放干部上来，以此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于是从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二十多天里，从学校到工厂，从干部到普通群众，我作了十几场报告。因为报告没稿子，讲起来比较随意，但基本问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分析干部队伍的状况。关键是对曾希圣的评价，认为曾是功大于过，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对安徽的工业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我们要象评价斯大林那样，评价曾希圣的功过是非。对干部的问题，我还是反复强调，勇于打击一小撮，敢于解放一大片，一定要做好被平反干部的思想工作。第三点是今后怎么办，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仍然是揭批李葆华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牢牢掌握这个大方向。只有掌握这个大方向，才能有力量制止武斗；只有支持、爱护解放军，才能有力地制止武斗。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不能用武化的方式来达到。枪弹只能夺走人的生命，不能夺走头脑中“私”字的权，意识的变革只能通过意识的批判来达到。到工厂去，如安徽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砂轮厂、探矿机械厂讲话时，我更多地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要坚守岗位，按质按量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这些报告在当时的形势下，收到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干部中反响较大。但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加深了干部队伍的分化，支持“八二七”观点的干部成了“G”派干部；支持炮轰解放军的干部，成了炮轰派干部。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